



Differences and Integration of Naming Methods of Sea Areas in China and the West

Wu Songdi

Abstract: The Chinese people began their sailing on the sea very early and formed an understanding of different sea areas. China faces the Pacific on the east. Ancient Chinese people believed that their land was in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which was surrounded by oceans called “the Four Seas”. Sea areas (including lake areas) were usually named after their geographical directions, such as “East Sea”, “West Sea”, “South Sea”, and “North Sea”. This kind of naming was applied to sea areas in China, and so was it in many countries out of China. “East Sea” was used for almost all the broad water areas on the east of China. But every geographical location has four sides. If we solely rely on the four directions, all the sea areas or lakes in the same direction would share a same name. In the West, sea areas were usually named after the names of states or regions nearby.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missionaries of Matteo Ricci, Didace de Pantoja, Jules Aleni and so on from the Western countries arrived and brought their geographical knowledge to China. In Great Universal Geographic Map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released in 1602, Matteo Ricci marked the sea areas between Korean peninsula, Japan Islands and Russia with the name of Japan Sea. In Chinese documents recorded by Liao, Jin,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this area was given the name of East Sea. In more than two hundred years after Matteo Ricci, none of maps was published in China, and Japan or Korea employed the name of Japan Sea. It started to prevail in Europe from the 1790s. And in Japan, the name of Japan Sea was accepted in the middl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Yet, this happened in China in about 1884. To sum up, the naming technique of seas area from the Western countries had not exerted a substantial influence on the East for a very long time.

Keywords: China; West; sea areas; naming methods

Author: Wu Songdi obtained his BA in History i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in 1982, MA and PhD in History in Fudan University respectively in 1986 and 1992. He worked as visiting researcher or visiting professor in Oxford University, Harvard University, Michigan University, Osaka University, and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the years from 2010 to 2015, he was director of Center of History Geography, Fudan University, which is key research bas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under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Now he is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at Center of History Geography, Fudan University, and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of Customs History and Customs Literatures, Fudan University. His main research areas cover history of China’s population, history of China’s immigrants, and economic and geographic researches in Chinese history.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include *Northern Immigrants and the Social Changes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History of China’s Immigrants in the Period of Sui,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Vol. III) and *History of China’s Immigrants in the Period of Liao, Song, Jin and Yuan Dynasties* (Vol. IV). He is editor-in-chief of *Economy Geography in Modern China* (9 vols.). Besides, he published *The Unpublished Internal Publications of Old China’s Customs Collected in the Library of Harvard University*.

中西方海域命名方法的差異與融通

吳松弟



[摘要] 中國人很早就興起了海上交通，並形成了對不同海域的認識。在古代中國人看來，中國居於世界之中，周圍環繞以海域，因而將環繞中國四方的海域統稱為“四海”。以中國為中心，對周邊的海域（乃至大湖的水域），按照東、西、南、北的方位加上“海”字，成為古代中國命名海域地名的基本方法。從對中國邊緣海域的命名，到對中國以外的海域的命名，大多採用這樣的方法。由於中國的海域主要位於中國大陸的東面，按照方位而言，這些海域都可以命名為“東海”，故古代的“東海”一名，幾乎用到了當時中國人所能認識到的亞洲大陸以東的各個海域。又由於地理

空間上的任何一個點，都有其東面、南面、西面或北面，如果都按照方位命名海名或湖名，還會導致不同的區域，甚至空間相隔遙遠的區域，都會有若干同樣的“海名”。而在西方，按所屬或靠近的國家或地區命名海域，即海旁邊的州域地名加“海”字命名海域，則是傳統方法。明朝後期，西方傳教士利瑪竇、龐迪我、艾儒略等人進入中國，開始將西方的地理知識包括海域命名方法傳入中國。利瑪竇於明萬曆三十年（1602年）在中國出版的漢字世界地圖《萬國坤輿全圖》上，將位於今朝鮮、韓國、日本、俄羅斯之間的海域標註為“日本海”。這一海域，在遼、金、元、明時期的中國文獻中主要稱“東海”。雖然利瑪竇依照西方的取海旁邊的州域地名命名海域的方法來標註這一海域，但此後的二百多年中，無論是中國、日本還是朝鮮出版的地圖上，在上述海域都未使用“日本海”一名，歐洲也同樣如此。自18世紀90年代開始，帶有“JAPAN”一詞的海域名纔開始在歐洲地圖上得到較多的使用，日本在本國地圖上普遍採用“日本海”這一海域名稱要到19世紀中葉，中國則遲至1884年前後。可見西方的海域命名方法，長期以來並未對東方的海域命名產生實質性影響。

[關鍵詞] 中國 西方 海域 命名

[作者簡介] 吳松弟，1982年在東北師範大學獲歷史學學士學位，1986年、1992年分別在復旦大學獲歷史學碩士和博士學位，先後在牛津大學、哈佛大學、密西根大學、大阪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擔任客座研究員或客座教授，2010—2015年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復旦大學歷史地理中心主任，現為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復旦大學海關史與海關文獻國際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從事中國人口史、中國移民史、中國歷史經濟地理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北方移民與南宋社會變遷》、《中國移民史》第三卷（隋唐五代時期）和第四卷（遼宋金元時期）、《中國人口史》第三卷（遼宋金元時期），主編九卷本《中國近代經濟地理》，整理出版《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藏未刊中國舊海關內部出版物》。

中國東鄰太平洋，沿海地帶一向是中國人的重要生活空間。中國人很早就興起了海上交通，並形成了對不同海域的認識，包括對它們的命名。明末以來，西方傳教士開始在中國傳播西方人對海洋地理的認識；在近代的全球化浪潮中，西方文化包括全球海域名稱和對海域的命名方法更是全方位湧入中國、日本、朝鮮等東方國家。今天東方各國的海域名稱，便是東西方不同的海域命名方法的具體體現。本文擬探討中國與西方的海域命名方法和西方海域命名方法的東來，並以日本海為例，分析今天的海域名稱形成的歷史背景，以供東亞海洋研究的學者參考。

上篇：中國古代海洋命名的方法

“海”是中國人對海域的通名。中國最早的字典《說文解字·水部》解釋“海”字：“海，天池也，以納百川者。”^①即海是各條河流最後注入的巨大的天池。而東漢末劉熙所著的字典《釋名·釋水》，則從海水的顏色着眼，對“海”另有一番解釋：“海，晦也，主承穢濁，其水黑如晦也。”在這裏，“主承穢濁”自然是接納各條河流注入的結果。

在古代中國人看來，中國居於世界之中，周圍環繞以海域，因此，中國古代地理學的“九州”、“九洲”、“赤縣”、“中國”等用來指古代中國地域範圍的地理名詞，都出於同樣的認識。宋人毛晃的《禹貢指南》是用早期的文獻解釋中國最早的地理書《尚書·禹貢》的著作。他在解釋“九州”、“九洲”時，引用了多家的說法。其中，李巡的說法是：“四方有水，中央高，獨可居，故曰洲，天地之勢四邊有水。”鄒衍的說法是：“九州之外有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內，故以洲為名，共在一洲之上，分之為九耳。”^②

環繞中國四方的海域，一般就稱之為“四海”，收入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中的《商頌·玄鳥》就有“肇域彼四海”一句。後人認為，此詩中的“肇”應當解釋為“兆”，“言正天下之經界，以四海為兆域是也”。^③在當時中原的人看來，他們的經濟文化水準要高於居住在靠近“四海”的周邊地區的“蠻、夷、戎、狄”，故有時他們便以“四海”作為蠻、夷、戎、狄的代名詞。在晉人郭璞作注、宋人邢昺作疏的《爾雅注疏》中，有“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皆四方極遠之國”；由於蠻、夷、戎、狄又統稱“四夷”，故《爾雅注疏》又有“此四夷皆際海，故謂之四海”。更有甚者，《爾雅注疏》甚至引孫炎關於“海”的有些隨意的解釋：“海之言晦，晦闇於禮義也，云知在東西南北者以曲禮云。”^④孫炎的話的含義是：蠻、夷、戎、狄不知禮義，不知禮義叫作“晦”，而“晦”就是“海”，因此他們居住地附近的大片水域就稱為“海”。而在《尚書·禹貢》中，將周邊蠻、夷、戎、狄前來中原朝貢，並逐漸接受中原文化影響的這種為以後歷代帝王所追求的理想，稱作“四海會同”。

中國周圍的“四海”，有東、西、南、北之分，於是中國人便以東、西、南、北等地理方位詞加於通名“海”之上，稱不同方向的海域為東海、南海、北海、西海。然而，這種對海域的具體劃分，在先秦時期還很少見於記載中國國內事務的文獻。在這些文獻中，一般祇有籠統的“海”，而沒有具體的東海、南海、北海、西海等專名。或許，這反映了早期中國人尚缺少比較頻繁的海上活動，至少缺少縱貫南海海域的航海活動，沒有必要細分各個海域。提到海域專名的早期文獻，大體都是記載域外地理的著作，而以《山海經》最著名。從這部融真實和想像、怪異於一體的名著中，人們看到了已有專名的東海、南海、北海、西海的“四海”以及它們的地理方位。

在《山海經》中，不僅有在今中國東部邊緣的海域的名稱，如精衛填海的東海，“琅琊台在渤海間、琅琊之東”的渤海，“郁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的南海，還有地域不明或可能在今

①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註》（成都：成都古籍書店，1981），第577頁。

② [宋]毛晃：《禹貢指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56冊。

③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王世偉整理，卷2“考證”。

④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卷6“釋地”。

中國境外的西海與罽于西海、北海等。從已知的幾個地名來看，《山海經》中的海名，完全依據東、西、南、北等地理方位來確定，如東海在中國大陸之東，南海在中國大陸之南。至於渤海，在當時人看來並非最北的海域，因此不能冠以“北海”，又或許由於其儘管在東部海域，但因今山東半島的阻隔，海域不如半島以南的海區面積廣大，因此亦不能稱“東海”，而祇能按照當時人在山東半島所見到的位置，命之為“渤海”。《史記·高祖本紀》提到齊國“北有勃海之利”，其下“索隱”便引崔浩對“渤海”的解釋：“云勃，旁跌也，旁跌出者橫在濟北，故《齊都賦》云‘海旁出為勃’，名曰勃海郡。”就是說，這片海域仿佛從一旁橫放在濟水河口的北面，所以稱為渤海。

先秦時期，人們除了將現代地理學意義上的海（大洋近陸地部分）稱為“海”外，也用來指內陸較大的湖泊。《山海經》所說的“西海”，至少有一個是指位於中國西部地區的湖泊。這樣一來，就使得“海”的使用範圍大大擴大，不僅海域可以稱“海”，湖域也可以稱“海”。然而，這種地理方位東、西、南、北之後再加上“海”字的命名方法，無疑帶有明顯的局限性。

首先，它使位於同一個較大的地理區域內部不同的海域或湖泊，因都使用帶有表示同樣地理方位的水域地名，而彼此難以區別。中國的海域主要位於中國大陸的東面，按照方位而言，這些海域都可以命名為“東海”。依照歷史文獻的記載，“東海”有時指中國東部的海域（但內海渤海往往不在內），有時指山東半島以南的海域（至少在元代甚至明代以前，今黃海尚無專名）。尤其值得注意的，今日本、韓國、朝鮮、俄羅斯四國之間的日本海，因俄羅斯的遠東部分歷史上長期屬於中國，這一海域在遼、宋、金、元、明、清時期也被古代的中國人命名為“東海”。^①

“東海”這一地名，也被朝鮮半島的人民所接受。直到今日，他們除了稱日本海為高麗海外，還稱其為“東海”。可以說，古代的“東海”一名，幾乎用到了當時中國人所能認識到的亞洲大陸以東的海域，北到今俄羅斯的庫頁島，南到中國臺灣之間的廣大海域。

其次，地理空間上的任何一個點，必然都有其東面、南面、西面或北面，如果都按照方位命名海名、湖名，豈不是不同的區域，甚至空間相隔遙遠的區域，都會有若干同樣的“海名”，導致空間的混淆？這一狀況，在中國最早的地理書《尚書·禹貢》中就有存在。此書既按照當時人的想法，以為在中國的東、西、南、北四面都有大片海域的存在，希望實現周邊民族都來中原朝貢的“四海會同”的理想，但又在西部的敦煌三危山的南面安了一個“南海”，導致長期以來經學家對《尚書·禹貢》記載的這個“南海”的今地爭論不休。如果考慮到按地理方位命名海域或湖泊這一悠久的傳統，或許可以認為，這一“南海”祇是三危山以南的某個大湖罷了。此外，今日本海海域在古代有多種專名。在唐代稱為“渤海”，此“渤海”的含義，按上引崔浩的解釋，指的是此海域是較大的海域（東海）的別支。從地理方位看，在中原的範圍內，位於今山東半島、遼東半島之間的渤海在東部海區的北部；而從唐代在中國東北建立區域政權，並極力模仿中原文化的粟末靺鞨人看來，今天的日本海在東北東部海區的北部，故也稱為渤海。此外，明代一支生活在今日本海北部的俄羅斯波謝特灣西岸的女真部落，由於日本海在他們生活地區的南面，又將日本海南部海域稱為“南海”。^②

漢唐以來，這種地理方位加“海”字的海域地名命名，不僅沒有改變，反而隨着中國對外交往的擴大，大量出現在介紹域外地理的著作中或翻譯過來的佛經中。例如，北魏酈道元所著《水經注》在述及天竺國（在今印度一帶）地理時，便引《釋氏西域記》，述新頭河“經罽賓、犍越、摩訶刺諸國而入南海”，而恒水“東流入東海”。^③當然，在介紹天竺國這種遠離中國的國家或地區時，中國文獻記載的“東海”、“南海”，祇能是以這些國家而不是以中國為中心來確定其方位。與酈道元同時期的人張揖在其所著《廣雅·釋地》中說：“四海內東西九十萬里，

①② 吳松弟：“中國載籍中的日本海地名”，《面向太平洋》1（1995）。

③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陳橋驛點校，第5、12頁。

南北八十一萬里。帝堯所治九州地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百四頃，其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雖然《廣雅·釋地》所載的里數和墾田數都屬於臆測，而“帝堯所治”的九州地也沒有東西、南北的里數，但文中第二個即“夏禹所治”的“四海”，其東西、南北的里數，卻祇相當於第一個“四海”的幾十分之一。這一點，足以表明至遲到了北魏時期，人們已普遍將“四海”這一地理概念推之到中國以外，成為“天下”、“世界”的代名詞，而不僅僅是中國周圍的東海、南海、北海、西海了。

下篇：晚明入華傳教士所傳西方海域命名方法對中國的影響

明朝後期，來自西方的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龐迪我（D. d. Pantoja, 1571—1618）、艾儒略（J. Aleni, 1582—1649）等人進入中國，開始將西方的地理知識和對世界的瞭解傳入中國。利瑪竇在中國繪製了當時的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艾儒略出版了《職方外紀》。在這些地圖和著作中，出現了許多以所在國家或地區的名字命名、中國人以往所不瞭解的海域地名。這些西方傳教士或許認識到，中國對海域地名的命名方式，早已成為中國強大的傳統文化的一部分，無法根本改造，如果要讓中國人接受所傳入的世界地理知識，必須適當變通。因此，他們將中國置於世界地圖的中心，並使用了按照東、西、南、北等地理方位之後加“海”字的海域地名。這一點，在利瑪竇所進、龐迪我翻譯、艾儒略增補並最後形成的《職方外紀》中，得到充分的體現。

艾儒略《職方外紀·四海總說》載：“（海）有二焉。海在國之中，國包乎海者曰地中海，國在海之中，海包乎國者曰寰海。……寰海極廣，隨處異名。或以州域稱，則近亞細亞者謂亞細亞海，近歐羅巴者謂歐羅巴海，他如利未亞，如亞墨利加，如墨瓦蠟尼加，及其它蕞爾小國，皆可隨本地所稱。又或隨其本地方隅命之，則在南者謂南海，在北者謂北海，東、西亦然，隨方易向，都無定準也。茲將中國列中央，則從大東洋至小東洋為東海，從小西洋至大西洋為西海，近墨瓦蠟尼一帶為南海，近北極下為北海，而地中海附焉，天下之水盡於此。”“海雖分而為四，然中各異名。如大明海、太平海、東紅海、孛露海、新以西把尼亞海、百西兒海，皆東海也。如榜葛蠟海、百爾西海、亞刺比海、西紅海、利未亞海、何折亞諾滄海、亞大蠟海、以西把尼亞海，皆西海也。而南海則人迹罕至，不聞異名，北海則冰海，新增蠟海、伯爾昨客海皆是。至地中海之外，有波的海、窩窩所德海、入爾馬泥海、太海、北高海，皆在地中，可附地中海。”^①

如將《職方外紀·四海總說》所提的海域名稱，與今日世界地圖上的海域名稱及其空間範圍相比較，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艾儒略所說的隨處異名的海域名稱，其第一類“或以州域稱”者，即海旁的州域地名加“海”字的海域名稱，乃是西方人命名海域地名的主要方法；而其第二類“又或隨本地方隅命之”的東海、西海、南海、北海四海，是將中國列寰球中央，對世界大洋按方位組合並命名之的海域地名，不過是來華傳教士為便於中國人理解世界地理，按照中國海域命名方式而編撰出來的地名，並非西方人命名海域的真實做法。即使西方的海域確實存在着按方位命名的海域名稱，其數量也極為少見。

中國傳統的海域命名，是將東、西、南、北等地理方位詞加於通名“海”之上。而艾儒略所說的“或以州域稱”這一海域命名原則，則向來是歐洲的海域命名傳統，在中國沒有使用過，因此，中國古代的文獻和地圖中難以找到這類海域地名。在這一方面，位於朝鮮、韓國、日本、俄羅斯四國之間的今名為“日本海”的海域，由於今俄羅斯遠東的黑龍江地區，歷史上曾經長期屬於中國或與中國保持密切的聯繫，在中國歷史文獻中留下關於日本海地名的資料，為人們提供了

^① [意]艾儒略：《職方外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94冊，卷5。

海域名稱研究的很好的個案。

在後漢、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歷史文獻對日本海尚無專門稱謂，在確定國家與地區方位時僅僅使用“大海”、“海”等泛稱，表明中原人民對此海缺少瞭解。唐武則天聖曆元年（698），粟末靺鞨在東北建立起較大的區域性政權渤海國，立國達二百餘年時間，被稱為海東盛國，與中原地區保持較為頻繁的來往，因此，中國載籍中有關日本海的記載開始增多。雖然《舊唐書》中《高麗傳》、《新羅傳》、《日本傳》，與《新唐書》中《黑水靺鞨傳》、《高麗傳》，在提到日本海海域時仍用“大海”、“海”等泛稱，但《新唐書》的《渤海傳》、《流鬼傳》，以及《唐會要》、《通典》等載籍，在提到日本海部分海域時都使用了專稱：今日本海極西、靠近今朝鮮東北部一帶的海域為“南海”，日本海的南部海域為“大海”，而包括韃靼海峽在內的日本海的北部海域則是“少海”。此外，粟末靺鞨人又稱日本海為渤海。到了遼、金、元、明、清時期，雖然某些時段的一些區域的人會稱某些海域為“鯨海”和“南海”，但主要稱為“東海”。清咸豐八年（1858），清朝將黑龍江以北的大片地區割讓俄國；第二年，又將烏蘇里江以東直至日本海西海岸的大片土地割讓俄國。儘管如此，在此後的二十餘年中，中國載籍仍沿襲舊稱，稱日本海為東海。^①

在西方，18世紀初年至19世紀初期這一百年餘年中，歐洲地理學界在今日本海域使用過多種地名，使用最多是帶有“Corea”一詞的海名，特別是“Sea of Corea”和“Mer de Corée”（見圖1）。自18世紀90年代開始，帶有“JAPAN”、“JAPON”一詞的海域名開始在歐洲地圖上得到較多的使用；但直到

圖1 1749年法國人所繪的地圖^②



19世紀二三十年代，仍有一些地圖使用帶有“Corea”一詞的海名。而最早在地圖上將今天的日本海海域標註為“日本海”的，並非出版於歐洲的世界地圖，而是明末來到中國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於明萬曆三十年（1602）在中國出版的漢字世界地圖《萬國坤輿全圖》。該地圖在問世後不久便流傳到日本，對日本地理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日本海”一名在1602年已出現在利瑪竇的《萬國坤輿全圖》中，但在利瑪竇的故鄉歐洲則遲至18世紀90年代，“日本海”這一地名纔在地圖上得到較多的使用。這一點足以表明，“日本海”一名並非利瑪竇從歐洲帶來，而是利瑪竇將歐洲“或以州域稱”命名海洋的方式用於東方海域的命名的結果。

還需指出的是，儘管近二百餘年來的西方地圖，大多按自己的海域命名原則，將中國東部的海域稱為“南中國海”、“東中國海”，但中國本土出版的地圖，仍然一如既往地按照中國傳統的海洋命名方式，標註“南海”、“東海”。日本同樣如此。雖然利瑪竇的《萬國坤輿全

① 吳松弟：“中國載籍中的日本海地名”，《面向太平洋》1（1995）。

② “Les Srs.Sanson/L'Asie/1749”，Hye Jung Collection. 轉引自韓國慶熙大學2003年出版的掛曆《古地圖·朝鮮海》（Antique Maps. Sea of Korea），由漢城大學地理系李琦錫教授贈送。

圖》已將今天的日本海海域標註“日本海”地名，此地圖不久便傳到日本並產生較大影響，然而在此後二百年左右即19世紀以前出版的日本地圖，仍然未在日本海海域標註地名；直到19世紀，日本地圖纔開始在這一海域標註“日本海”地名，但有的地圖在這一海域的西部仍然標註“朝鮮海”。例如，日本地理學家高橋景保（たかはしかげやす，1785—1829）於1810年所繪的《新訂萬國全圖》，在日本列島以東的海域標註“大日本海”，而在今朝鮮半島的東部海域（即今日本海的西部海域）則標註“朝鮮海”（見圖2）。這一海域普遍使用“日本海”地名是在19世紀中葉。而在中國文獻和地圖中，大約到清光緒十年（1884）前後，即利瑪竇《萬國坤輿全圖》出版二百八十年之後，纔開始在地圖上出現“日本海”這一專名，從而代替長期以來這一海域的專名“東海”（某些時期又稱其南部為“南海”）。

圖2 1810年高橋景保所繪的地圖^①

② 利瑪竇《萬國坤輿全圖》出版二百八十年之後，纔開始在地圖上出現“日本海”這一專名，從而代替長期以來這一海域的專名“東海”（某些時期又稱其南部為“南海”）。

利瑪竇、艾儒略等人在世界地圖上按照中國傳統，將中國置於世界中心，並按中國原則命名一批海域名稱，以及“日本海”一名未被中國、日本、朝鮮採納，均表明這些傳教士帶來的世界地理知識的一些內容，尤其是對海域的命名方式，並未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知識體系有多少影響，反而使利瑪竇在某些方面不得不接受東方的做法。有學者認為，利瑪竇去世之後，他繪製的世界地圖在中國就被打入冷宮，日後鮮被引用。^③聯繫到海域地名，可以認為這一說法確有根據。

綜上所述，以中國為中心，對周邊的海域（乃至大湖的水域），按照東、西、南、北的方位加上“海”字，是中國古代命名海域地名的基本方法。從對中國邊緣海域的命名，到對中國以外的海域的命名，大多採用這樣的方法。按照這樣方法命名的中國邊緣海域名稱，凡最後命名者，從古代一直使用到今天。而西方“或以州域稱”，即按所屬或靠近的國家或地區命名海域的方法，則是西方的傳統。自利瑪竇《萬國坤輿全圖》出版以後，“或以州域稱”的海域命名開始傳到東方，但在此後的二百年左右時間裏，按照這種方法命名的海域地名尚未被中國、日本等東方國家所接受。就以“日本海”這一海洋地名為例，直到19世紀中葉，西方的船隊大批出現在東方以後，日本、中國等東方國家纔開始較多使用“日本海”這一地名。即使這樣，西方的海域命名方式仍未對東方的海域命名產生實質性影響。

① [日]高橋景保：“新訂萬國全圖”（部分，1810），《古地圖セレクション》（神戸：神戸市立博物館，1994），第81頁，文字見第88—89頁。

② 吳松弟：“歐洲和日本古地圖中的日本海地名”，《面向太平洋》1（2002）。

③ 江靜：“利瑪竇世界地圖東傳日本述略”，《中華讀書報》2003-07-02。